

乡俗中国

我去寨头，与其说是去作人类学的田野考察，

还不如说是去那里生活罢，或者说，我就是去那里走亲访友的。我去了，一次又一次地，不厌其烦地，

寨头苗家风俗录



潘年英 著

在那里跟像老万这样的人结交朋友，跟他们喝酒聊天，我为了什么呢？我收获了什么呢？我不知到。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在寨头的那些日子里，我内心安宁，感觉快乐。



上海文化出版社

乡俗中国

寨头苗家风俗录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寨头苗家风俗录/潘年英著.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9.

(乡俗中国)

ISBN 978 - 7 - 80740 - 393 - 7

I.寨 … II.潘… III.苗族 - 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 考察
报告 - 丹寨县 IV. K892.3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7910 号

出版人

陈鸣华

责任编辑

赵光敏

装帧设计

许 菲

书名

寨头苗家风俗录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n.com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889 × 1194 1/24

印张

7.5

图文

180 面

版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80740 - 393 - 7/K · 210

定价

54.00 元

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 021 - 65410805

{序

这一回，该轮到自己说话了。

已经记不起来当初确切的动因了。为什么去三穗？去寨头？去那样一个已经十分“现代化”了的地方？那样一个已经不再“原生态”了的地方？民族学，或者人类学，在中国当然算不上显学，但这几年也还是热闹。学界里自不用说，就是社会上，现在这个词也不再陌生了。从事这一行当的学者们所追求的学术目标，向来都是要到“远离自我”的那样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中去索解知识，或者从所谓的文化“他者”中求得自我的文化反思和观照。因此之故，一些远离中心的蛮荒之地，自然就成了他们从事所谓“田野作业”的首选之地。所以，无论是在云南，还是在贵州，或者在中国西南怎样边缘偏僻的乡村，只要其文化本身有独特性，就不乏人类学家的身影。我自然也不例外，在此之前的许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黔东南山区的各个角落。我被那些奇异的少数民族文化吸引，犹如吸毒一般不能自拔，至今脚步不歇。多年来，我这个伪劣的人类学学者，一直乐此不疲地在西南乡村的田野里行走和跋涉，还被人经常赞赏为是一种“敬业”精神，其实真正的意图恐怕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或者我自己也并不真正地明白？然而这一回，我却走了似乎不同甚至相反的路。我来到的这个叫寨头的苗族村寨，距离县城很近，320国道从寨子中间穿过，上瑞高速公路也经过寨子旁边。从外表上看，这个寨子可以说几乎没有什
么可以吸引人们眼球的东西，杂乱而无





序的新修的水泥砖房，还有差不多已经全面汉化了的服饰，甚至语言，也一样的远离了传统。

然而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不止一个人推荐我一定要去看看寨头，说真是值得一观。我那时对寨头全无概念。其实每次由家乡天柱上凯里或贵阳，都要从寨头经过——在高速公路通车之前，那是必经之地。还有寨头所属的台烈镇，或者寨头附近的岑松镇，既然是必经之地，也十分的有名。往来家乡与省城间，我的身体也的确无数次地从这地方经过了，只是心里并不明白这地方其实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寨头、台烈、岑松等苗寨。许多时候，汽车会在这地方减慢速度，甚至干脆停了下来，那样的情形，往往是遇到了乡民赶场的日子。那时候我就能看见一些身着一种叫阴丹蓝的传统服饰、头戴一张尖尖角花帕的妇女在街边走动，她们的衣裙长过膝盖，而围腰则绣满五彩图案和纹饰，十分美丽迷人。很奇怪，我从不打听和询问，就在心里断定穿着这种服饰的妇女是侗族——当然这也并非毫无根据，因为这支苗族和镇远报京的侗族在服饰上几乎完全一致（当然后来知道她们的区别是在头帕上）——我那时心里暗自期许，希望什么时候找机会来做些田野考查，把这支“侗族”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当然也一直没机会，事情就这样悬置着。而寨头这个地名依然不断有人给我叨念和推荐。大约是2002年前后吧，我的同乡杨秀锡先生调任三穗县县长，好几回在凯里等地与他相遇，他就非常诚恳地邀请我到寨头去采风。再后来他又升任三穗县委书记，又向我诚挚地邀请。遗憾由于原因种种



都没能成行。直到2007年夏天，我才因偶然到凯里出差的机会，得以踏上三穗和寨头的路。

坦率说，第一次到寨头，我的印象很平淡——毕竟还是过于沉化了。据说这个上千户人家的苗寨曾经也像雷山的西江一样美丽，木楼缘山而建，鳞次栉比，一样规模宏大，气势磅礴。但在2000年之后，由于缺少相应的保护政策和措施，这个寨子的木楼很多被水泥砖房取代了。现在已然与别处的汉族村寨一样，没有了任何直观文化形式上的区别——但接下来的考察，却使我对寨头有了新的认识。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寨头的历史和文化，远比我想象的要深厚而迷人；其次是我觉得像寨头这样正在由传统向现代急剧转型的民族村寨，其实是很具有观察的价值和意义的。那就是说，我们平时去考察和旅游的那些民族村寨，是刻意保护下来的“特例”，也是非常态的民族村寨，而寨头则是常态的，其代表了更为广泛的民族村寨的真实状况。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寨头的苗寨才更具有一般民族村寨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有一回，寨头的老万问我：潘老师你说寨头都这样了，还有旅游开发价值吗？我说有，谁说苗族村寨就只能是木楼而不能是砖房？在我看来，寨头成规模的青砖楼房恰恰构成了它区别于其他苗寨的显著特点！

就这样，我决定留在这个寨子里



后



进行我的所谓的人类学田野观察。

从2007年夏天开始，到我最近一次去寨头，我前后四次进入寨头考察，其间滞留寨头的日子加起来约有二十来天。我在那里吃，在那里住，在那里过节、拍照、聊天和闲逛，我当然比一般旅游者对寨头有了更多的见识和体会。而这些见识和体会自然也会催生和促成我的专业的人类学田野考察报告的写作，但更多的时候，我却并不看重所谓的学术。在我看来，经历本身远比学术重要，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人生的游历远比知识本身更丰富和精彩。所以，我去寨头，与其说是去作人类学的田野考察，还不如说是去那里生活罢，或者说，我就是去那里走亲访友的。当然，这样说，未免显得有些矫情了，但其实我说的真是心里的大实话。我去了，一次又一次地，不厌其烦地，往返于乡村的寨头与城市的湘潭之间，我在那里跟像老万这样的人结交朋友，成天跟他们喝酒聊天，我为了什么呢？我收获了什么呢？我不知道。或者说，我心里明白，但说不出来，说出来的都不是真实的感受。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在寨头的那些日子里，我内心安宁，感觉快乐。

寨头不是我旅行的起点，更不是终点。我知道我要走的路还很多，很远，所以回首去日，我为我曾写下的这些文字深感欣慰——这些写于孤寂旅程中的文字，就是我曾经在黑暗的寒夜里无数次仰望星空的证明。

}

2008年8月16日于湘潭

目录 {

[自序]	一
[壹] 塞头初录	一
[贰] 塞头二录	十七
[叁] 塞头三录	五一
[肆] 塞头四录	八九
[伍] 塞头补录	一五七

}



初录

古时为哪样，人少饭也少，是哪样原因，造成这样子？

不是为哪样，因涨满天水，把人淹死完，山崩地也裂，谷种淹没完，人少饭也少。

说到淹没淹，共淹没几次，谷物才淹完，人少饭也少？

从前淹没淹，共淹没三次，天崩地也裂，人少谷物稀。

——《寨头苗族古歌》

壹



二 “六月六”

我走过的许多地方都是命定的，就仿佛是在前世里约定好了似的。这一回去三穗的寨头也一样。去之前没有任何约定，也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却不知道什么缘由，就突然决定要去了，好像突如其来而使人避之不及的一场暴雨，或者一种猝然降临的命运。当然去寨头之前，我对这寨子早已心向往之。因为这些年来我在黔东南的山地里漫游，常常听人议论到这寨子。还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我就曾多次听人说起过这寨子。说这寨子的苗族风情是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的有意思，又是如何如何的值得一看，云云。听得多了，我当然就难免心动。然而也一直没有找到恰当的成行时机。这样拖延下来，一晃，二十多年过去，竟然拖到了21世纪的初期。

2007年7月里的一天，我出差凯里，因为去早了两天，中间还有一点点空隙时间，就突然心血来潮地给我那在三穗县法院工作的初中同学彭开禄院长打了一个电话，问他是否在



三穗，有没有时间陪我到三穗乡下玩两天？他说在三穗，也有时间陪我玩，还说三穗良上这几天恰好有个民俗活动，叫“六月六”，很值得一看。真是天赐良机，机会难得。第二天上午，我就赶到三穗，并马不停蹄地直接赶往良上乡参加当地群众的“六月六”活动。时令正当盛夏，当地苗族群众身着传统服装，在乡政府门前的广场上载歌载舞，欢度节日。那场面十分可观。我发现，这支苗族的服饰很独特，和别处的苗族很不一样。她们的服饰分两种颜色，一种为黑色，一种为蓝色。着黑色衣服时同时佩戴一块有刺绣的围胸，着蓝色衣服时则没有佩戴围胸。但无论着黑色衣服还是蓝色衣服，其样式都是左衽、无领、衣长及膝，整套服饰显得比别处苗族简洁，明丽，但一样镶有刺绣和花边。而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则是她们的头帕，被折成一个船形三角戴于头上，显得格外醒目而与众不同。这也是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结识这一支苗族。应该说，我对于这种服饰并不陌生，但我一直不能确定她们所属的民族。我的故乡在天柱县，与三穗相邻，从天柱去凯里或贵阳都必须经过三穗县，在高速公路修通之前，还必须经过剑河的岑



松镇。那时候,我每次乘汽车去凯里或贵阳,都能在岑松镇上见识到这种服饰,当时我只觉得它奇特而美丽,却不知道穿戴这种服饰的竟然是苗族——因我早年去过镇远报京做过民族文化考察,印象中觉得报京侗族的服饰也是这样式,所以我一直以为穿戴这种服饰的应是侗族。但这次到了良上之后,我才明白她们不是侗族,而是苗族。

那天陪我去良上的除了彭开禄院长外,还有一位是三穗县法院姓贺名仁斌的副院长,他是本地人,对于民族学他没有什么兴趣。但因为曾经长期在基层工作,他对于当地民族的情况并不陌生。我问他三穗良上苗族的服饰跟镇远报京侗族的服饰是否相同?他说,相像,但不相同。他说她们衣服的样式差不多,但头帕完全不一样。他又说,很奇怪,有着这种服装样式的就只有这么几个地方:三穗的良上、巴治、寨头,剑河观么乡的新民、新河,还有就是镇远的报京。经他这么一说,我更加好奇了,因为这里涉及到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他们怎么可能在服饰上几乎一致呢?是文化交流的结果?还是另有原因?我对这些问题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

当天上午我和彭院长及贺副院长在良上乡政府所在地观看当地村民跳芦笙舞欢度“六月六”,之后又随杨乡长一同前往小巴治和巴





治进行民族文化考察。遗憾那天群众大多外出,加之时间仓促,我们没有做更加深入细致的访问,只是在村寨里随便走走,看看,因而也没有见到我期待的某些文化内容。总体的印象,是觉得这几个民族村寨的传统文化正在被汉文化同化和覆盖,而迅速走向消亡,我对此充满了忧

虑。恰好晚上回良上时，又碰巧遇到前来跟村民一道欢度节日的三穗县委书记杨秀锡同志，我跟他作了简单的交流。他说，三穗县的民族传统文化消亡得太快太厉害了，我们做了一些挽救的工作，但仍然无济于事，所以你来得正好，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我问他还有没有保留得比较完好一点的民族村寨？他说，传统的建筑基本没有保存完好的了，但从民族风情上来讲，寨头还保存得相对完好，你有时间就去那寨子看看，希望能给我们作些具体的指导。

我答应他第二天一定去寨头看看。本来就是计划中的行程，当然正求之不得。

“千家寨”

就这样，第二天，即7月20日上午，我跟随法院的彭开禄院长和贺仁斌副院长一同来到心中仰慕已久的寨头苗村。





我怎么也没想到，寨头原来就在320国道上，就在三穗去凯里的公路旁边，因而事实上我曾经无数次经过这村寨，但这寨子的确太现代了，也太普通了，如果仅从外表上看，实在没法引起人们格外的注意。

寨头原来不叫寨头，叫“千家寨”。那是按照寨子的实际规模来取名的。叫“寨头”是后来的事情，是根据苗语的意思来取名的。“寨头”在苗语里叫“偕岛”，翻译成汉语就是“寨头”的意思。故在历史典籍里，常有记载说：“寨头者，苗疆之门户也。”事实上，寨头也的确是苗疆门户。因为从地理上说，寨头位于黔东南的东部，是东出湘西的大门，如果我们以凯里、台江、剑河等地作为苗疆中心，那么，寨头作为千里苗疆门户就是顺理成章的；再



八

从当时的人口规模上来看,史籍里记载的寨头人口有千户,称为“千户苗寨”,至今仍有近1200户,约4800人。毫无疑问,这样的人口集中的寨子,不仅在历史上的苗族地区是少有的,就是在今日的整个黔东南或贵州省,也都是少见的,所以,称其为“苗疆门户”,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在历史上,寨头也的确承担起了苗疆“桥头堡”的功能和作用。以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的苗族农民起义为例,当时的清军就是从寨头突破而攻入苗疆腹地的,而那一次的“寨头保卫战”的最终失利,也成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苗族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这天早晨,我随彭院长和贺副院长顶着烈日走进寨头。这寨子分布在一片大坡上,村寨缘山而建,由山脚一直延伸到山顶。公路从寨中穿过,刚好把寨子切割为上下两半。我发现,建在下寨的多半是砖房,而建在山腰上的则以木楼为主。我问贺副院长这是怎么回事?贺副院长说,下寨的人家看来经济情况要好些,所以都基本上把原来的木楼拆了,换上了新的砖房,同时下寨有不少的人家是因为修高速公路后



从对面的山上搬迁过来的，他们得到一笔补偿款，所以就直接修起了砖房。

我们从公路爬坡往上寨走，走到坡顶，差不多可以鸟瞰整个寨头村全景。从坡头上看过去，山脚下还有田园，有河流，对面又是山坡，而凯里到玉屏的高速公路也正从山头上经过。这时候我才看清楚了，寨头村其实是位于一条狭长的山谷里的，其开阔地带均被开辟为农田，而村寨则建立在半山腰上，这和我先前见过的那些传统的苗寨基本一样。传统的苗寨通常选址于山腰或山顶，从风水学上讲，这样的选址比较符合其民族信奉的“龙脉”学说；而从生活的美学上讲，其在较高的位置选择寨址，则无疑给人以更为开阔的视野，给人有登高望远、极目风光的美感；而我又曾从苗族的历史研究中悟出，其寨址的选择观念，实际上还包含着一种朴素的生态科学思想，那就是既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山区泥石流造成的灾害，同时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有效的土地，以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而在战争年代也能进退自如，留有余地。

